

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

■本报记者 张文静

1583年,即万历十一年,在当时的看来是平淡无奇的一年,但在今日回看,它却是影响后来历史走向的至关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张居正去世还没多久,即被万历皇帝清算,“万历新政”立时崩溃,明朝的衰亡自此几成定局。恰在此时的北方,努尔哈赤的父、祖均被明军所杀,使他日后决然走上复仇灭明的征途。

就在这王朝更替暗潮汹涌

的前夜,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来自意大利的两位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抵达了中国,他们在这一年获得了官方许可,正式进入广东肇庆开始传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大椿的目光就聚焦在了这两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外国人身上。在他看来,正是这两人的到来,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序幕,也成为他出版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两部百万字大书的起点。



2018年10月出版
《西学东渐》,刘大椿等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师夷长技》,刘大椿
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1 错失机会

1583年,利玛窦来到了广东肇庆。这里是他进入中国传教的首站,也是他凭借科学知识崭露头角的地方。

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本不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而是他们传播基督教的一种手段。然而,就是这个传教过程中的副产品,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肇庆,利玛窦挂出的世界地图,迥异于中国人的世界观,给人们极大的冲击。为了迎合中国人的传统心态,他机智地将中国画在了地图的中央,使地图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利玛窦还给官员们赠送地球仪、地球仪、日晷等科学仪器,以获取好感,笼络人心。科学手段和传教目的被他很好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明王朝,刚刚经历了“万历新政”带来的短暂繁荣,开始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的黄昏。即使庞大的专制帝国在日渐衰落,但在刘大椿看来,晚明的科技发展却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科技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在明朝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实用技术和工程,比如航海、纺织、冶金等方面,仍然领先于世界,并出现了《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重要的总结性科技著作。

“明朝与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此长彼短,各有千秋。”刘大椿说,“利玛窦等人到来之后,欧洲新科技传入中国,一些中国士大夫,比如徐光启,也

迅速吸收这些新科技。”

在肇庆居住六年,利玛窦先后来到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一步步接近权力中心,影响也一点点扩大。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利玛窦顺利留在北京后,历史进入动荡的17世纪,这也是西学东渐风生水起的一个世纪。一方面,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中国士大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可谓群英荟萃。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帝王对传教士的态度都不差。万历皇帝喜爱利玛窦贡献的方物;天启皇帝有感于红衣大炮的威力而赞成耶稣会士来华;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很信任,对传教士也不排斥;顺治皇帝对汤若望恩宠有加;康熙皇帝更是亲自学习西学知识。

在刘大椿看来,明末,一个稳定的西学共同体已经在推动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近现代科技转型初现端倪,甚至可以想象,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将会迎来发生科技革命的机会。

然而历史走向有其自己的轨迹。康熙皇帝后期对西学态度转变,钦定西学东渐的思想,到了雍正、乾隆、嘉庆时期,中国社会重新走向了闭关锁国、文化专制的状态,西学东渐式微。

从西学东渐到西学东源,这段历史被刘大椿称为“第一波西学东渐的失败”,它构成了《西学东渐》一书的主要内容。中国第一个近现代科技转型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何为西学东源?“到了18世纪,人们认为西学也没什么了不起,它其实就是从东方传播过去的,是我们早就有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又从西方传播回来了。这就是西学东源的思想。”刘大椿说。

康熙在后期大力倡导西学东源思想,黄宗羲、钱大昕、戴震等著名学者也都坚信此说,并通过大量考据来证明它。“这种思想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中国传统科技的路子上去。而此时正是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发展的时期。西方科技走向现实,而中国科技走向了故纸堆。”刘大椿说。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清王朝的对外封闭和文化专制。“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承认西方科技的先进和强大,更未主动寻求科技转型。”刘大椿说,“科学在古代中国从没有获得过独立地位,始终从属于皇权意志。”

康熙喜欢数学,就开了算学馆。传教士白晋建议开科学院,他不感兴趣便否决了。康熙死后,后来的皇帝不喜欢数学,算学馆只好停办。乾隆也曾重用郎世宁等传教士,但只是把他们视为“家臣”。而在同时期的法国,科学院作决策,国王也无法干预。“科技转型需要很多东西支撑,明清时期,我们什么也没做。”刘大椿说。

2 不懈追求

中西方科技的第二次相会是在战场上,且以清王朝的一败涂地告终。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震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逐步取得了共识,那就是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远落后于人。自魏源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不管政治舞台上如何似走马灯般变换,向西方学习科技的共识一直不曾改变。

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科技开始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一个漫长的、顽强的、充满曲折和惊喜的、时而痛苦时而辉煌的凤凰涅槃的过程。”刘大椿评价道。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西学东渐的第二波”,这也是《师夷长技》一书述说的内容。

在刘大椿看来,此时的西学东渐不再是一个偶然的、被动的事件,而是一个被准确定位的、目标明确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与第一波西学东渐主体的盲目自大相比,第二波西学东渐的主体自觉技不如人,通过输入、仿造、译介、留学、引进机构和办法,办现代教育,设研究所等举措,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进行了科技移植,并从原有的科技模式中走了出来,基本实现了中国科技的近现代转型。100年来,在持续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做到了这一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3 重现历史

“两波西学东渐的过程,就是中国科技近现代化的过程。”这也是刘大椿组织团队花费四年时间进行相关研究,并最终呈现出《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这两部著作的原因,他希望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以中国科技近现代历程为主线,串联起两段历史中的人和事,绘制出中国科技艰难而壮丽的历史发展图景。

刘大椿对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问题的研究兴趣,从20多年前就开始形成了。1995年,他出版了《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和《中国科技体制的

转型之路》两部著作,对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以及当代的科技演变、体制转型作了关注和思考。

此次出版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两本书,虽然也是学术著作,但刘大椿并不希望满篇都是枯燥的长篇大论。“我们希望能把这400多年的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不是戏说或说话,而是用严谨的历史著作的形式把中国科技近现代的转型故事呈现给大家,把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和看法讲清楚。也希望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与转型问题有所启示。”

新中国70年科技出版十件大事发布

12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科技出版十件大事暨2019年出版百种科技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编辑专业委员会主任郭德征,宣读科技出版十件大事。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十件大事分别是:科技出版社经过两次发展高潮,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方面军;《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创刊,促进科学发展和学术交流;《中国植物志》《杂交水稻学》等科技出版巨著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并走向世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出版,先后两次召开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科技发展使我国出版进入光与电的数字出版新时代;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成立,助力科技出版;开展全国优秀科技书刊评比表彰活动,引领科技出版高质量发展;解困科技专著出版,各类科技图书出版基金相继设立;全国科技出版单位举行以“出版转企改制后总编辑工作”为专题的研讨活动与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出版单位总编辑工作的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作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部署。

中国出版协会原副主席周谊称,这十件大事可视为“新中国70年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史纲”,基本上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出版事业性质、功能的定位,反映了党的出版方针以及各个时期的发展方略、任务和措施,记录了科技出版工作者奋发图强、积极奉献的发展历程与巨大贡献。

此外,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吴宝安发布2019年出版百种科技新书。百种科技新书分为学术专著、技术专著、科普读物、工具书四大类别,包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大行动计划研究丛书》等55种学术专著;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交通建设科技丛书“特大型桥梁防灾减灾与安全控制技术”》(5册)等28种技术著作;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科技改变中国系列丛书》(6册)等10种科普读物;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力工程设计手册》(31册)等7种工具书。这100种科技图书均为列入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9年1月至9月出版的科技图书。

该活动由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编辑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馆共同主办。

(李芸)



《证据: 90载化石传奇》,王原、吴飞翔、金海月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全书采用了编年体例,共分九章,从1929年始,到2019年止,每十年为一章,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脊椎学以及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肇始、动荡、新生、蓄势、不屈、重启、起飞、爆发、繁星。

11月30日,裴文在周口店找到的那枚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头骨(标本模型),在中国古动物馆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90周年纪念展”特展上展出。90年前,它的出现标志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自此“肇始”。

■本报记者 胡珺琦

用90件标本追溯90年历史

和这枚头骨一同面向公众的,还有一本“十月怀胎”孕育诞生的新书《证据: 90载化石传奇》。这本书以90块化石标本为线索,讲述了90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发展脉络,也折射了中国在90年时间里由弱到强的“进化”历程。

讲述生物演化的壮丽篇章

古生物学是一门以化石材料为基础的学科,化石就是这门学科的命脉。对于已经走过了90年光明的古脊椎所而言,它所珍藏的无数骨架和石器正是其发展和成功的基础。

一年前,古脊椎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拍即合,提出了“90件化石,90年历史”的图书策划思路。“然而,经古脊椎所历代科学家双手的化石数以百万计,所管理现存标本24万件,要从中挑选90件,难度可想而知。”古脊椎所所长邓海坦言。

最终,主创团队以“有故事、有颜值、具有广泛性”为原则,分别在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和人类,以及石器与装饰物门类中,做了精选。每一块化石都有独立的传奇故事。作者对它们的解读包括了主要特征和重要价值,发现和发掘的过程、地质背景、挖掘和研究技术的突破以及历史影响等。

书中还配有二维码,包括张弥曼院士、吴新智院士在内的28位古生物学家通过视频介绍了他们研究的化石标本,让读者深入了解化石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首先展示的是从鱼到人生物演化的壮丽篇章。”邓海表示,书中的这些化石无一不是对阐明生物演化、判断地层时代或重建气候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的。

例如,初始全颌鱼连接了软骨“原颌”和硬骨“新颌”,半甲齿鱼弥合了从颌甲向背腹演化的缺环,它们都是进化论中特别受到关注的中间过渡类型;地层时代主要依据化石确定,如赫

氏水龙兽、南雄阶齿兽就分别是三叠纪和古新世的标准化石;西藏拟攀鲈生存于热带温暖水体,西藏披毛犀活跃在高原冰天雪地,则是探究气候环境变化的关键线索……

本书作者之一、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提到,这些化石的组成,最终构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树”,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它们在演化进程中的位置。

还原历史的脉络

标本虽是主角,但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把每个故事置于具体的历史叙事的情境里。“战争,新中国成立、运动、改革开放,这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无一不在这门学科前行的路上有所折射。”本书作者之一、古脊椎所研究员吴飞翔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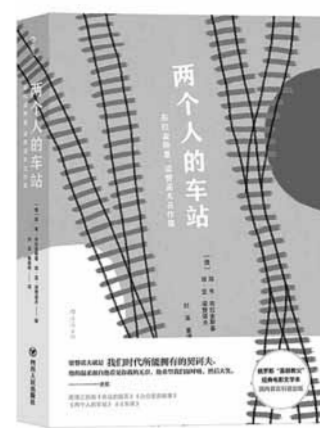
因此,全书采用了编年体例,共分九章,从1929年始,到2019年止,每十年为一章,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脊椎学以及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肇始、动荡、新生、蓄势、不屈、重启、起飞、爆发、繁星。

值得一提的是,90件标本中仅有4件发现于1949年之前,当时的古脊椎所还只是地质调查所一个小小的新生代研究室。直到1953年4月,古脊椎所在北京成立,并设周口店工作组,成为我国第一个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研究的独立机构,这门学科才真正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并逐渐成为全世界该领域研究最活跃的地方。

二战期间,本该漂洋过海避难的“北京人”化石,在一片混乱中不知去向。日军曾“约见”裴文中,追问这些化石的下落,可他宁肯在铁窗度日,也拒不回答。后来,裴文中、贾兰坡用尽余生去寻找它们,却终不得见。

中科院院士刘嘉麒在新书发布会上说:“作为后人,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件事。因为,使命还未完成。”

荐书



《两个人的车站》,【俄】埃·韦·布拉金斯基、埃·亚·梁赞诺夫著,刘溪、童道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两位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联合编剧,首部作品是《看好你的车》,此后20余年共同创作了《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等多部经典作品,形成了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式的喜剧风格。在他们的作品中,讽刺与幽默、诗意与哲理、浪漫爱情与社会批判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悲剧与喜剧因素相互交织和渗透,流淌出人性的暖流。

本书包括《两个人的车站》《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车库》这几部风靡一时、成为几代人银幕记忆的电影作品的剧本改编小说和舞台演出本,系初次引进出版,并收录翻译家童道明的经典译本,另附专门撰写的导读文章。



《紫禁城的黄昏》,【英】庄士敦著,高伯雨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本书已经成为讲述溥仪个人命运乃至晚清民国历史的经典之作。作者庄士敦在中国生活了30余年,1919年至1924年,他身为溥仪的英文老师,见证和参与了溥仪所经历的一系列浮沉奇遇。

此书曾有过多种译本出版,高伯雨译本是首次在大陆面世。高伯雨对于晚清掌故信手拈来,但从未以夸张渲染和奇闻异事博人眼球,在翻译中,即使是并不紧要的人名,他也仔细考证辨别,展示了过去时代一名优秀掌故家的风范。

除了对文本的翻译,全书包含两百多条译注,使用了同时代的报刊、日记、溥仪自己的回忆录等材料,补充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能见到的诸多隐秘关节,并以客观的眼光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点评和校正——例如破除庄士敦带有东方主义的迷信,指出溥仪并不像庄士敦心中那样完美——从而冷静、真实地还原了时代的面貌,显示着高伯雨和庄士敦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之间的裂隙和对话。



《时间望着我》,【路人甲】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1998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鲁敏写出了第一篇小说《寻找李斐》;1999年写作散文《青春期》。从小说起步的鲁敏,虚构与非虚构的创作是同步的。

三册随笔集《时间望着我》《路人甲或小说家》《虚构家族》是鲁敏非虚构作品的首次完整集结,收录了个人随笔、创作漫谈、阅读笔记、文学对话与演讲等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三册均由鲁敏亲自自选,从“我读”“我说”到“我说”,全面、完整而立地揭示了一个“70后”代表作家的文化滋养和创作经验。《以父之名》《母亲》《胡迁之死》等备受关注的文章亦全文收录,其中《母亲》已被译成英、俄、阿拉伯和保加利亚语等多种文字。



《一字不识》,【林之著】著,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花”是一幅花朵生长的画,“冬”天与结绳记事有关,“万”是一只蝎子的模样,“它”是一条蛇变化而来……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是远古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虽历经几千年演变,与我们今日的生活依然密切相关,如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如区分季节的春、夏、秋、冬,如家,如畜,如花,如月……这些看似普通的汉字,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古老故事和生活场景?它们最初的本义是什么?又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

“我们用了几千年的汉字,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一直在讲故事。”在作者的讲述中,这些汉字仿佛有了生命般,穿越历史长河,在纸上跃动起来。(喜平)